学科本体论、中国化路径与教育体系构建
——“中文创意写作”入列二级学科后的讨论

谭旭东　李霞

摘要：2024 年“中文创意写作”正式获批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标志着该学科迈入建制化发展新阶段。两年来，学界聚焦合法性确证与主体性构，通过厘清学科内涵、融通中西资源与应对 AI 挑战，持续夯实学科根基；整合地域文化资源与古典文论传统，推动学科从“资源引进”向“本土构建”转型，在疗愈写作、创意阅读、创意思维等领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同时，围绕课程设计、教学模式、教材建设与人才培养等实践议题，在跨学科融合、科技赋能与国际经验本土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中文创意写作已从概念移植迈向理论自觉，形成了多元开放、内外融通的发展格局。未来，学科仍需以持续的创新活力回应时代之问。

关键词：“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建制；教育体系建构

Disciplinary Ontology, Sinicization Path, and Educa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Discussions after “Chinese Creative Writing” Was Listed as a Second-Level Discipline

Tan Xudong, Li Xia

Abstract: In 2024, “Chinese Creative Writing” was officially approved as a second-level discipline under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rking the discipline's entry into a new stage of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focused on the confirmation of legitima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continuously consolidating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by clarifying disciplinary connotations,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resources, and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AI; it has integrated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traditions, promoting the discipline’s transformation from “resource introduction” to “local construction,” and has formed theoret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fields such as therapeutic writing, creative read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At the same time, around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odels, textbook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fruitfu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the localize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hinese Creative Writing has moved from conceptual transplantation toward theoretical self-awareness, forming a development pattern that is pluralistic, open, and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integrated. In the future, the discipline still needs to respond to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with sustained innovative vitality.

Keywords: “Chinese Creative Writing”;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alization; educa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自 2009 年上海大学设立国内首家研究机构、复旦大学创设首个专业硕士点以来，创意写作在中国历经十五年的本土化探索后，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以“ 中文创意写作 ”之名正式获批为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从此，正式成为中文学科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迈入建制化发展的新阶段。

创意写作学界内外对这一历史性转折进行了多维度的审视与阐释。葛红兵在系统解读专业要求后，提出“ 中文创意写作 ”应以此为契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建制化发展之路[①]；梁慕灵与黄树基认为，该学科的设立填补了以往中文教育偏重学术研究而忽视创作实践的缺口[②]；常俊跃以学科互鉴为切入点，论述了“ 中文创意写作 ”的创设对推动外语学科发展的借鉴意义[③]。从更宏阔的角度来看，张永禄将之视为学科发展的历史性机遇[④]；谭旭东进一步指出，该学科由“ 自设 ”转向“ 建制 ”，其意义不止于其身份的正式确立，更在于它将超越既有学科框架下的生存权与话语权之争，成为驱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乃至更大范围人才培养体系深层变革的关键力量[⑤]。

“ 中文创意写作 ”获批二级学科后，系列学术会议相继召开[⑥]。在反思学科发展隐忧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西方创意写作实践传统与中国语言文学学术根基的有机融合，走出一条具有自主性的中国特色建制化路径，正引发学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相关论述颇为丰富。然而，针对学科建制后近两年的成果述评尚付阙如，亟待系统梳理与评析[⑦]。基于此，本文聚焦 2024 年 1 月以来的中文创意写作研究成果，在梳理核心议题的基础上探寻其学术演进的脉络，展望其未来研究图景。

一、学科本体论：合法性确证与主体性建构

2024 年 1 月，“ 中文创意写作 ”正式获批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结束了自主探索的漂移状态，进入学科建制的稳固轨道。学界因此展开了一场关于学科“ 合法性 ”与“ 自主性 ”的深度反思与建构。

（一）合法性确证

传统人文教育与文学教育难以回应“ 学科有用性 ”的质疑，而创意写作则实现了技术理性和

① 葛红兵：《中文创意写作二级学科发展的新阶段、新挑战——2024 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文创意写作”专业要求解读》，《写作》2024 年第 2 期，第 31—34 页。

② 同注①。

③ 常俊跃：《我国中文学科创设“中文创意写作”二级学科对外语学科发展的启示》，《英语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207—216 页。

④ 张永禄：《创意写作的学理基础、现实障碍与实践路径》，《中国文学批评》2025 年第 3 期，第 129—137+160 页；张永禄：《建构社会功能导向的中文创意写作学》，《探索与争鸣》2025 年第 3 期，第 161—168+180 页。

⑤ 谭旭东：《“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确立与高校中文教育变革》，《写作》2024 年第 2 期，第 35—37 页。

⑥ 2024 年 12 月 7 日，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以“作为二级学科的创意写作：现状、发展与可能”为主题在郑州召开；同月 12 日，“文艺理论批评与创意写作前沿论坛”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兴举行。2025 年则先后举办“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研讨会暨广东省写作学会（5 月 25 日）、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年会（10 月 29 日）、全国高校创意写作联盟年会暨李洱研究中心交流会（10 月 29 日）。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届创意写作年会以“融合与创变：AI 时代中文创意写作的学位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主题在重庆西南大学召开（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集中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学科发展面临的新命题。与此同时，中国中小学创意写作联盟 2025 届年会（初中）以“AI 时代的创意写作与中小学作文教学”在广州举行（11 月 15 日至 16 日），显示出创意写作的教育向基础教育的持续延伸。

⑦ 关于建制前一年（2023 年）的创意写作研究评述，参见黄潇、李枭银：《正名之前：创意写作中国化的理论现场——2023 年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述评》，《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255—265 页；刘卫东、张永禄：《2023 年中国创意写作研究年度观察》，《写作》2024 年第 4 期，第 24—33 页。

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①]。作为一种以文字为媒介的创造性精神活动，创意写作主动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在服务“文化强国”与“创意国家”建设的实践中确证自身价值[②]。

正是这种回应现实需求、实现自我革新的能力，使其纳入规范的学科体系成为历史必然。而学科的确立，也必然会引发对其身份认同与合法性的追问。这一建制化成果，正如王本朝所言：“既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调整和发展，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文学教育在知识、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面融合与创新”[③]。葛红兵在学科合法性确证的框架下指出，面向文化强国战略、创意经济需求与数字技术变革，新建制主义创意写作学以培养原创性上游创意人才为核心目标[④]。詹艾斌则从学科发展、交叉融合、人才培养及文化战略四个维度对此进行回应：“独立设科这种制度创新不仅重构了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版图，更在繁复的现象深处重塑着文化创新的生态系统。中国文学教育也正迎来从‘解释世界’到‘创造世界’的范式革命”[⑤]。

在回应时代命题的过程中，创意写作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文化国家等维度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已成为中文学科体系中不可替代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在创意经济时代发挥更大作用[⑥]。王威廉亦认为，创意写作不止于文学创造，更是对持续转型世界的回应与反思。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它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现实、理解自我、表达思想的独特途径，使我们在社会变迁中保持内在力量与精神清醒，持续焕发创造力，为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新的活力[⑦]。

（二）主体性建构

如果说合法性确证为学科提供了“为何成立”的外部理由，那么主体性建构则奠定了其“如何自立”的内部根基。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正趋于全面。

第一，厘清学科内涵。吴俊从学科整体设计出发，指出该新设二级学科在内涵与范畴具有显著的包容性：纵向上贯通大学语文、大学写作与创意写作各个层次；横向上融合写作实践与理论研究[⑧]。在此基础上，宋时磊进一步作出精细化界定，认为“中文创意写作”以中文为表达工具与创作载体，依托独特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创作特定类型的作品，既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类作品，也涵盖适用于多种场景的非文学性应用文。其核心要求在于熟练运用语言和文化知识，表达独创性的观点、思想与情感，同时有效回应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⑨]。

第二，融合中西资源。学界对学科发展格局达成共识，即必须走一条“国际视野”与“本土根脉”

① 参阅王磊光：《创意写作是文学教育的另一个名字》，《创作评谭》2025 年第 1 期，第 55—59 页。

② 参阅葛红兵、马兵：《创意写作的概念、原理及建制化发展——创意本体论创意写作写的基本主张及其建制度实践》，《当代文坛》2025 年第 1 期。

③ 王本朝：《中文创意写作与文学教育的创新发展》，《写作》2024 年第 5 期，第 10—13+40 页。

④ 葛红兵：《中文创意写作的新建制主义之路》，《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45—48 页。

⑤ 詹艾斌：《增强历史主动，推进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现代化》，《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49—67 页。

⑥ 参阅张永禄：《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的社会功能》，《写作》2024 年第 2 期，第 38—40 页；许道军：《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目标刍议及达成设想》，《写作》2024 年第 2 期，第 41—43 页。

⑦ 王威廉：《创意写作与“剩余的文学性”》，《北京文艺评论》2025 年第 1 期。第 123—130 页。

⑧ 吴俊：《“工科大学时代”的大学人文及人文通识课——兼谈如何认识学科意义上的创意写作》，《文艺争鸣》2024 年第 11 期，第 16—22 页。

⑨ 宋时磊：《中文创意写作的学科内涵、实现路径与拓展方向》，《写作》2024 年第 3 期，第 89—96 页。

相结合的新建制主义之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葛洪兵与陈颖强调要回溯“五四”以来的“创意论”精神，构建具有中国路径、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学科发展格局[①]。罗长青则更侧重于理论源流的融合，主张从传统“文章学”与现代“写作学”理论中汲取养分，从而构建一个融通中西的创新学科体系[②]。

第三，回应时代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中文创意写作的冲击，折射出该学科在建制化进程中理想愿景与实践落地的现实矛盾[③]。部分学者敏锐地捕捉到 AI 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呼吁学科进行主动调适。许道军认为，创意写作学科应以这一技术变革为契机，重新审视学科定位，努力成为 AI 写作时代的算法开发者、使用主导者与成果评判者，从而为国家的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及全民写作提供有力支撑[④]。葛红兵与陈颖则从创作主体角度出发，在拒斥人本主义对 AI 简单抵制的同时，强调其对平民创意的赋能作用[⑤]。谭旭东在细致梳理人工智能在观念、技术、类型、传播以及著作权五个层面的挑战后，指出 AI 写作无法取代创意写作，但后者可借助前者实现其教育使命、文学使命与写作使命[⑥]。蓝庆保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素养对创意激发具有重要作用，主张创意写作教育应融入人工智能素养的相关内容[⑦]。

与此同时，技术的介入也带来了新的困境。罗长青指出，不同领域对人机合作的作者身份、原创性及著作权认定的接受程度参差不齐，唯有构建尊重创新、明确责任、平衡权益的伦理和法律框架，方能推动形成健康有序的人机协同创作生态[⑧]。余蔷薇则表达了创作主体能力培养的隐忧，指出 AIGC 凭借其高效迭代的写作能力，可能会阻塞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成才路径；即便采取积极的人机协作模式，也有可能对创作学习者的核心能力造成釜底抽薪式的削弱[⑨]。

此外，亦有学者呼吁回归创作的本体价值。孙国玲以创意为本位，援引深度心理学理论，聚焦内在自性与创造力生成的转化机制，倡导创意写作学应回归写作对于人的本体意义，使之成为普通人实现心理疗愈与自我发掘的有效路径[⑩]。

二、中国化路径：资源整合与理论自觉

随着“中文创意写作”正式成为二级学科，如何融通西方经验与本土传统，实现学科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学者们从资源整合与理论建构两个维度展开探索，逐步明确了中文创意写作本土化的演进方向。

（一）资源整合

国内研究者持续引介与整理西方创意写作资

① 葛红兵、陈颖：《中文创意写作学的“新建制主义”》，《探索与争鸣》2025 年第 3 期，第 153—160+180 页。

② 罗长青：《从文章学到创意写作：学科渊源、挑战及发展》，《中国文学批评》2025 年第 3 期，第 138—146+160 页。

③ 史婉莹：《中文创意写作领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演进与回应》，《写作》2025 年第 4 期，第 16—26+81 页。

④ 许道军：《AI 写作的兴起与创意写作学科重构》，《中国社会可测评价》2025 年第 2 期，第 1125—131+160 页。

⑤ 葛红兵、陈颖：《AI 时代的创意写作》，《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2025 年第 4 期，第 47—54 页。

⑥ 谭旭东：《人工智能时代创意写作面临的挑战及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5 期，第 49—55 页。

⑦ 蓝庆保：《人工智能时代创意写作教育的新变与挑战》，《惠州学院学报》2026 年第 1 期，第 19—24 页。

⑧ 罗长青：《重塑边界：AI 赋能创意写作的角色、范式及争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 年第 4 期，第 55—63 页。

⑨ 余蔷薇：《创意写作教育何为——以媒介变革中的文学创作群体普及化为观察视角》，《当代文坛》2026 年第 1 期，第 61—67 页。

⑩ 孙国玲：《AI 挑战下的创意写作“自我发掘”路径构建——基于深度心理学视角》，《当代文坛》2025 年第 5 期，第 114—120 页。

源。葛红兵、张永禄、刘卫东等学者立足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经验、现代文论与写作学传统，结合当代创意写作学的国别发展实践，从实践论、功能论、范式论等方向着力推进中文创意写作学的国内文献建设，为学科的本土化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①]。然在此过程中，西方创意写作资源的本土适配性问题日益凸显。薛梅曾对此进行反思，主张不应将中国文学的创作多样性简单纳入语言中心主义的西方技巧体系，而应深入分析中国文学独特的话语与意象组合方式，揭示“中国风”文本的符号构成范式，总结本土化的书写成规，从而推动创意写作的中国化构建[②]。谭旭东认为要重视创意写作人才培养的中国化经验，而且他认为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是多方面的，有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变革，作家观念的转变，也有对人的潜能的再认识，更有对传统的文学写作的再改造[③]。胡伟亦指出，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应在积极融入全球对话的同时，更需深入挖掘、整理与转化中国本土创意写作资源[④]。

近两年来，诸多学者将目光投向地方文学实践，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刘卫东、陈舒慧和毛佳敏聚焦温州作家周吉敏的文学创作，发现其作品立足地方文化资源，将狭义的文学元素与广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融通，诠释了文学如何在地方土壤中生长出兼具传统底蕴与当代活力的表达形态[⑤]。与之相似，刘文奇探究陕西文学资源开发与创意写作的内在联系，剖析陕西特有的文学资源在主题、风格等方面对创意写作的影响，为地域文学资源的创意转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⑥]。武战红关注内蒙古民俗文化这一具有鲜明地域与民族特色的领域，以创意写作视角探索民俗文化的文学转化路径[⑦]。相晓冬则通过分析巴蜀文化符号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为具有巴蜀文化底蕴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动能[⑧]。

学者们在探讨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时，不仅聚焦于特定地域空间的文化资源开掘，也着力于历史时间维度的纵深研究，力求从深厚的民族文学传统中为当代写作寻找源头活水。在这一过程中，古典资源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例如，张怡微从“故事新编”的叙事视野出发，辨析不同框架下的创作发生机制，主张从古典叙事中汲取养分，并将其视为创意写作学科实现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路径[⑨]。与此同时，对传统文体的继承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如王增宝主张在摹体创写、本色当行的原则下，应对传统文体资源加以重视与转化[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文学在追求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进程中，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传统。新文学作家在思想探索和创作实践中积累

① 葛红兵、张永禄、刘卫东：《创意写作学研究的国际文献观察与综述》，《惠州学院学报》2025 年第 1 期，第 1—10 页。

② 薛梅：《创意写作何以受阻——由〈受戒〉引发的创意写作中国化思考》，《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4 年第 4 期，第 49—56 页。

③ 谭旭东：《学科视域下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及其传播策略》，《文艺论坛》2024 年第 1 期，第 47—53 页。

④ 胡伟：《在交流互鉴与传承创新中建构中文创意写作学科》，《惠州学院学报》2026 年第 1 期，第 1—5 页。

⑤ 刘卫东、陈舒慧、毛佳敏：《创意写作视域下地方原创型文化人才发展策略探析——以周吉敏“传承写作”实践为视点》，《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39—149 页。

⑥ 刘文奇：《数智时代陕西文学资源开发与创意写作关系研究》，《大河美术报》2025 年 3 月 14 日第 11 版。

⑦ 武战红：《基于内蒙古地区民俗文化的创意写作研究》，《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25 年第 1 期，第 60—66 页。

⑧ 相晓冬：《文学创意写作中巴蜀文化符号的运用研究》，《新传奇》2024 年第 37 期，第 43—45 页。

⑨ 张怡微：《从“故事新编”到“追踪蹑迹”——“创意写作中国化”理论取径的可能性》，《当代文坛》2024 年第 2 期，第 54—61 页。

⑩ 王增宝：《“得体”：创意写作与中国传统文体资源的现代转化》，《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16—24 页。

了丰富经验，这无疑为当下创意写作提供了可直接借鉴的丰厚资源[①]。

就正名之后的中文创意写作而言，关键在于对核心概念的在地性重构。以“非虚构写作”为例，这一关键概念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不断增殖自身、扬弃自我，践行中国化创意写作所推崇的开放性与生长性[②]。这种转化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概念演变上，更需要深入到具体的创作方法中，词语主义路径便是这样一种尝试。它以词、形、场三者的协同运作，将零散的诗教经验转化为可分解、可验证的理性系统，既回应了传统诗教现代转型的诉求，又观照了新诗文体的认知深化与活力再生，使古典文论在当代写作中焕发新生[③]。

在更广阔的大众文学与类型文学场域中，传统资源的转化则呈现出更为绚烂多彩的面貌。在科幻文学领域，中国科幻作家们正积极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和民间传说，通过续写、扩写、仿写、重述、引用等改编重构手法，探索神话历史与现代科幻结合的有效机制[④]。在网络文学领域，玄幻文学之所以能从众多类型中脱颖而出，达到可与西方奇幻文学比肩的创作高度，与之对中国古典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与有效转化密切相关[⑤]。可见，当前中文创意写作正经历从“资源引进”到“本土构建”的深度转型，研究路径呈现出空间、时间、方法三维并进的态势，并通过大众文学领域的实践，探索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活力的激发。

（二）理论自觉

“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地位的确认，必然要求理论体系的自洽与完善。近年来，学界不再满足于对欧美创意写作工坊模式的移植，而是致力于在吸收外来资源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创意写作理论体系。

其一，理论蓝图的重审。随着理论建构意识的觉醒，本土理论著作因其对学科体系的开创性尝试而备受关注。例如，陈勇彬在评价《创意写作学理论》时指出，该书从三个层面建构了创意写作学的理论体系：一是通过基础理论研究，厘清学科合法性及其研究范围；二是借助微观理论，重新定义新时代语境下的文学与写作；三是从宏观层面，系统梳理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及创意国家之间的关系。该体系虽尚未完全成熟，却为中国创意写作学提供了一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理论蓝图[⑥]。

其二，理论资源的创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学，首先面临的是理论资源的选择与整合问题。谭旭东与王雅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识别出可供利用的五类理论资源：英语国家的创意写作理论资源、西方文艺理论资源和作家创作论资源、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论（创作谈）资源、中国创意写作的探索性理论和教学经验、中国写作学理论资源和写作教学、作文教学经验等，这些无疑既包括西方理论资源，又涵盖本土实践资源。他们指出，要使这些理论资源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有效理论，需通过阐释性创化、应用性创化与融合再造性创化，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

① 李洪华：《创意写作的古典传统与现代反思》，《写作》2025 年第 5 期，第 9—15 页。

② 陈晓辉：《创意写作视阈下中国化非虚构性写作概念探究》，《当代文坛》2024 年第 5 期，第 164—172 页。

③ 黄潇、施岳宏：《从“词语”进入新诗创意写作——论新诗创意写作教学建制化的词语主义路径》，《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79—92 页。

④ 程夏敏：《神话历史的创意改编与重构——当代中国科幻对传统写作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写作》2024 年第 2 期，第 58—68 页。

⑤ 王明宪：《网络玄幻小说：中国本土的奇幻创意故事》，《文艺论坛》2025 年第 2 期，第 45—54 页。

⑥ 陈勇彬：《创意写作学的理论蓝图——评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理论〉》，《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 2 月，第 253—261 页。

意写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①]。高翔对西方创意理论模型给予了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蒂娜·齐莉格的斯坦福创意教育模型、罗伯特·斯滕伯格的创意心理学模型以及戏剧家赖声川的创意金字塔模型。这些模型的引介与对标，为中国创意写作工坊的运行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②]。此外，他还分析了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麦基的故事冲突理论，提炼出六种可操作的冲突设计模型，实现了文学理论从抽象到具体的有效转化[③]。王烯与葛红兵则将目光转向创意资源的社会化流动与产业转化，探讨了文学创意资源的城市空间流动本质[④]。

其三，核心理论的革新。在借鉴欧美创意写作理论的同时，学界也致力于挖掘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如苏热通过比较中国古典小说与欧美创意写作的人物塑造方式，探讨了中西对话对创意写作中国本土化的启示[⑤]。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二元并置模式，而是以“创意”为核心逻辑，推动写作学理论的一元化重构[⑥]。比如，秦莉莎区分了“创意阅读”（作者式阅读）与传统的“接受性阅读”（读者式阅读），将其确立为创意经济时代的阅读新模式[⑦]。这种转变不仅打破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也将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文化记忆、文学经典 IP 转化、创意国家建设等宏观议题相联结，形成更具包容性与介入性的理论视野[⑧]。面对数字化浪潮，研究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与数字人文主义理论，对数字化创意写作中的技术异化问题进行了哲学分析，并提出数智赋能、跨学科融合等重构策略，推动创意写作在技术时代回归“人的全面发展”本旨[⑨]。

其四，其他理论的深化。在核心范式转型的引领下，学者们对创意写作的多个具体领域的理论进行了精细化深耕。疗愈写作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葛红兵与李枭银探讨了其“创意性”和“疗愈性”，并基于艾布拉姆斯艺术批评“四要素”勾勒出疗愈写作的理论地图，强调疗愈写作比其他写作行为更加关注作者与具身性环境的联结[⑩]。在内容层面，巩晓琳以“创伤叙事”为中心，揭示了创意写作、心理疗愈与文学研究三者相互促进、成果互转的协同机制[⑪]；在实践层面，魏维探索了将疗愈写作理论融入创意阅读与创意写作的具体路径[⑫]，叶炜与周旺则从学科交叉视角分析线

① 谭旭东、王雅：《中国创意写作的理论资源及其创化》，《写作》2025 年第 4 期，第 5—15 页。

② 高翔：《创意激发理论体系及其工坊应用刍议》，《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94—105 页。

③ 高翔：《创意写作故事冲突及工坊应用探索》，《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27—141 页。

④ 王烯、葛红兵：《文学写作创意资源的城市空间流动机理与发展进路》，《广东社会科学》2025 年第 3 期，第 182—193 页。

⑤ 苏热：《论中西小说人物塑造方式对创意写作中国本土化的启示》，《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25 年第 1 期，第 115—119 页。

⑥ 袁智忠、覃胜菊：《创意思维视域下创意写作的学术突围：从二元并置到创意统合的重构》，《语文学刊》2025 年第 4 期，第 31—37 页。

⑦ 秦莉莎：《作者式的阅读如何成为可能——创意阅读问题研究述评》，《惠州学院学报》2025 年第 1 期，第 18—25+73 页。

⑧ 王烯、葛红兵：《文学经典 IP 的跨时代重构与传播——基于创意写作学的研究视角》，《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6 期，第 86—93 页。

⑨ 焦瑜、张闯、何彬：《技术异化与主体性解放：基于数字化创意写作的哲学分析》，《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6 期，第 56—62 页。

⑩ 李枭银、葛红兵：《创意写作如何追求幸福——疗愈写作及其“四要素”的理论阐释》，《文艺评论》2024 年第 6 期，第 1—9 页。

⑪ 巩晓琳：《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心理疗愈与文学研究的协同作用——以“创伤叙事”为中心》，《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01—108 页。

⑫ 魏维：《基于个体疗愈性的创意阅读与创意写作——武夷学院创意写作课程新探》，《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55—164 页。

上疗愈写作工作坊的理论支撑与应用价值[①]，李枭银则将进一步深化了疗愈写作对创意写作的理论启示[②]。凡此种种探索，皆表明疗愈写作为创意写作本土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契机，有望在“创意中国”的宏观视野下，向文学全领域贡献出独特的理论声音[③]。

“中文创意写作”理论的深化同样体现于多维度和多层次的研究探索中。徐强对“采风”这一特色实践进行理论建构，从概念、历史、功能、类型等方面确立“采风学”的内涵，实现了从田野实践到学科理论的自觉升华[④]。翟树宁则从文学、文论及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角，探讨创意写作潜能的开发，拓展了该领域的理论视野[⑤]。在核心能力培养方面，陈晓辉将“创意思维”视为创意写作的根本命脉，强调从思维到创意思维的转变是中国化创意理论深化研究的必然结果[⑥]。徐瑞皓进一步研究了如何通过推理与发散等创意思维训练方法激发文学想象力，丰富了创意写作的上游训练理论[⑦]。在跨学科融合与实践应用方面，孔唯佳引入空间理论与文化记忆理论，探讨创意写作在教育场域中的空间性转向[⑧]。孙国玲将分析心理学的自性化理论引入儿童创意写作研究，提出了自由表达、真实表达、想象力激活与转化三大实践原则[⑨]。刘竺延对“作家创作谈”进行体裁界定和类型划分，指出其作为“自反批评”和“创意载体”的独特价值[⑩]。

由此可以说，“中文创意写作”已实现从概念移植到理论自觉的跨越，在批判性吸收西方资源的基础上，着力推进本土化转化。通过挖掘传统文论、回应时代命题、深耕具体领域，初步形成了多元开放、内外融通的理论格局，为创意写作的进一步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教育体系建构：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

正如葛红兵在《创意写作的价值与未来》中所言，中文创意写作学科成为中文二级学科仅是学科建设的起点[⑪]。这是汉语文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将对大学语文教育、写作水平和能力造成深远的影响”[⑫]。随着“学术学位”的授予，如何构建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完善评价体制、优化人才培养路径等问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对此展开深入探讨，呈现出本土意识与全球意识交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研究态势。

（一）学科建设的图景审视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文创意写作”正面

① 叶炜、周旺：《线上疗愈写作工作坊的理论支撑和价值维度》，《河池学院学报》2025 年第 6 期，第 15—21 页。

② 李枭银：《作为“身体实践”的疗愈写作及其对创意写作的理论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25 年第 5 期，第 207—214 页。

③ 参阅孔唯佳：《疗愈写作：创意写作本土化的新维度》，《中原文学》2024 年第 36 期，第 3—5 页。

④ 参阅徐强：《创意写作的田野教学实践——东师创写丰满屯采风营报告》，《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19—126 页；徐强：《采风学发凡》，《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3—15 页。

⑤ 翟树宁：《文学 、文论、文化视域下创意写作潜能的开发》，《嘉应文学》2025 年第 13 期，第 44—46 页。

⑥ 陈晓辉：《从思维到创意思维：中国化创意写作教学的根本路径探讨》，《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3—17 页。

⑦ 徐瑞皓：《推理与发散——创意思维训练中的文学想象力激发》，《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39—50 页。

⑧ 孔唯佳：《教育场域中的创意写作——重建文化记忆下的写作教学范式》，《河池学院学报》2025 年第 3 期，第 25—31 页。

⑨ 孙国玲：《分析心理学视域下儿童创意写作的实践原则》，《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85—195 页。

⑩ 刘竺岩：《作家创作谈的体裁界定、类型划分与研究意义》，《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213—223 页。

⑪ 葛红兵：《创意写作的价值与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 年第 5 期，第 28—34 页。

⑫ 高玉：《中国写作教育的历史、学科化与发展趋势》，《写作》2024 年第 4 期，第 9—23 页。

临如何高效推进学科建设、切实提升学科水平、增强学科竞争力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李继凯从三个方面为学科勾勒出建设蓝图：突显写作行为的文化创造特质与价值，明确“中文”与“创意”相结合的学科定位及创新追求，展现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多元开放的发展格局[①]。

在学科化进程加速的同时，王宏图提出了重要警示——应警惕过度学科化的倾向，注重保持其实践品格与艺术创造本色。许道军通过对“写作”“学科”和“学术”的辨析，进一步廓清了这一领域的复杂内涵，指出作为新质写作生产力的“中文创意写作”，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与多元路径[②]。黄平进一步提出，其未来发展需与作协系统、文化产业系统深度融合，既要像其他学科一样推进自身的知识化与理论化建设，也要更为重视鲜活的创作实践[③]。

随着学科边界的拓展，创意写作的理念也开始辐射至传统写作领域。管曙光指出，中文创意写作为公文写作提供了全新视角，具体体现在引入创新理念、激活创意思维、强化学科互补、深化科技融合、聚焦内容创新、凸显创意元素等六个维度[④]。同样关注应用文写作的李红秀则主张，将公文写作纳入中文创意写作范畴，使其从课程教学层面提升至学科建设的高度。同时指出当前多数应用写作研究仍局限于技巧，忽视了传播效果与受众反馈，缺乏对写作成果实际影响的关注[⑤]。

然而，在创意理念向外辐射、影响力日益扩展的同时，其自身的发展困境也日益凸显。创意写作在规模扩张中始终未能突破的“三重困境”构成了学科本体危机的核心表征：“天赋论”将创作神秘化，消解了教育介入的可能；“文学性”的狭隘理解，将学科禁锢于纯文学的象牙塔；而经验主义的教学传统，则往往导向了“创意写作作品”的程式化生产[⑥]。这恰恰是创意写作入列二级学科后亟待解决的问题。王海峰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指出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正趋向深度融合，但人才培养仍是当前发展的核心痛点，并指出创意写作学科建设需在产教融合、跨学科拓展与社会诗学建构等诸多领域持续发力[⑦]。

海外创意写作在发展过程中已形成各具特色学科模式，国内学者对这些经验进行了充分借鉴。刘健指出，国内应明确创意写作概念以凝聚共识，借鉴多元模式以加强实践能力培养，并推动学科融合以拓展合作路径[⑧]。在能力培养层面，丁圣俊倡导培育创意思维。一方面，主张借鉴既有成果构建的创造性思维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建议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评价融入学科教学全过程[⑨]。在实践机制层面，苏岑对韩国“新春文艺制度”进行了专题研究，揭示了制度化征文赛事在写作人才培养中的关键功能。当前国内创意写作学科

① 李继凯：《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写作》2024 年第 5 期，第 5—9 页。

② 魏维、王宏图、许道军：《文学教育、作家培养与学科前沿问题：创意写作两条路线的来源、发展与新变——王宏图、许道军访谈》，《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25 年第 2 期，第 1—7 页。

③ 黄平：《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当代文坛》2024 年第 1 期，第 61—70 页。

④ 管曙光：《“创意写作”对公文写作的启示》，《应用写作》2025 年第 2 期，第 4—6 页。

⑤ 李红秀：《应用写作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兼论袁智忠的〈公文传播学〉》，《应用写作》2025 年第 5 期，第 4—8 页。

⑥ 刘卫东：《超越经验主义——中文创意写作学的观念冲突》，《探索与争鸣》2025 年第 3 期，第 169—176+180 页。

⑦ 王海峰：《创意写作教育的文化产业痛点》，《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24 年第 2 期，第 24—31 页。

⑧ 刘健：《海外“科学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及其启示》，《科普创作评论》2025 年第 2 期，第 43—53 页。

⑨ 丁圣俊：《创造性思维评价标准驱动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创意写作教学为例》，《现代教育》2025 年第 7 期，第 17—23 页。

与主流或大型文学比赛之间存在脱节，建议将征文大赛引入学科实践，在日常教学中加强对相关赛事的宣讲与引导，实现学科与文学生产机制的有效衔接[①]。

除借鉴海外经验外，国内部分地方院校率先突破传统，构建了以提升学生创意写作素养为核心的“进阶式”教育实践体系。该模式通过多元专业规划、跨学科调整以及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力求在“守正”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②]。沿着这一改革方向，如何使理念落地，学者们结合不同院校的实践给出了多元回应。在育人空间建构上，郭依诺以西北大学为例，指出该校文学院以文学魅力为根基，通过举办多元化的线上线下活动打造了兼具活力与人文关怀的文学交互空间[③]。在跨学科融合上，朱丛迁、魏微、刘卫东通过探讨澳门科技大学创意写作学科的实践，展示了立足地域文化优势、将科技元素融入工作坊的创意写作新范式[④]。在破解现实困境上，徐凌则直面地方院校的痛点，以宜春学院为个案诊断出地方院校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上面临的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三统三合”的改革思路及“四融四特”的应对策略，构建了以“两翼”“三分”“四化”“五能”为核心内容的人才培养路径[⑤]。

（二）课程体系的系统构建

近年来，伴随着创意写作学科的快速发展，众多高校相继设立相关学位点。然而，不少“分体写作”课程实为传统文体研究或传统写作课程的变形，在教学观念与方法上与创意写作的本体要求相距甚远[⑥]。学科地位的确立使“如何教”进入新一轮讨论热潮，相关研究已从课程设计、教学模式、教材建设等维度全面开展。

第一，课程设计与教材建设。学界普遍认为，构建一个连贯、科学且覆盖多学段的创意写作课程体系是当前学科建设的核心。雷勇、黄子俊和周思言通过考察全球 20 余所高校，提出涵盖基础、进阶、深化、特色及跨学科的五类课程构想，强调课程的层次性与衔接性[⑦]；李金凤明确主张课程设置应贴近学生实际需求和发展目标，通过分层次教学、多样化文本训练以及强化实习实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⑧]；胡伟进一步倡导构建大中小学构建创意写作一体化课程体系，明确各学段教学目标，设计衔接教学内容，开发多样化的教学资源，并推动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模式[⑨]。唐玖江的博士论文遵循“写作取向阐释、现状分析审视、逻辑理路分析、要素框架构建、要素实践应用”的研究路径，系统构建了统整取向的写作课程内容[⑩]。这些探讨共同反映出学界对于建立一个连贯、科学且覆盖不同学段与不同水平的课程体系的迫切愿望。

因此，具体文类的写作教育如何嵌入并丰富

① 苏岑：《韩国写作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新春文艺制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67—172 页。

② 汪亚琴、李汉桥：《创意写作素养融入中文系人才培养的思考》，《嘉应文学》2025 年第 22 期，第 182—184 页。

③ 郭依诺：《数智赋能下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文学院创意写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三角洲》2025 年第 35 期，第 69—71 页。

④ 朱丛迁、魏维、刘卫东：《文化传承、科技因素与创意城市——澳门科技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建设访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29—138 页。

⑤ 徐凌：《地方高校创意写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以宜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萍乡学院学报》2024 年第 2 期，第 112—116 页。

⑥ 谭旭东、王雅：《我国高校创意写作研究生培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中国大学教学》2025 年第 6 期，第 25—35 页。

⑦ 雷勇、黄子俊、周思言：《世界创意写作课程体系研究报告——基于对 20 多所高校的考察》，《河池学院学报》2025 年第 2 期，第 18—28 页。

⑧ 李金凤：《反思与前瞻：中文创意写作教育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师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 年第 5 期，第 42—46 页。

⑨ 胡伟：《基于小学视角的大中小学创意写作一体化构建研究》，《语文教学通讯》2025 年第 27 期，第 4—8 页。

⑩ 唐玖江：《统整取向的写作课程内容构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25 年。

这一体系，成为值得深究的问题。高尔雅与叶文瑶通过对六所海外高校非虚构写作学科与课程设置的分析，提炼出该文体在高等教育环境下的基本特点，进而为中国非虚构写作专业发展提出四点启示：重塑思维模式，构建多元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力量与拓展教学模式，发展课程资源以助力学生成才[①]。何敏聚焦科幻文学，构建了“输入——过程——输出”的动态教学模型，将创意写作教学流程化与模块化[②]。周文波则探讨了新诗写作教学如何与创意写作的“创意”本质相契合，强调通过“审美陌生化”体验和工坊语境，让学生在诗艺的研习中获得语言精神的升华[③]。

在深耕各类文体教学的同时，学者们亦从宏观层面展开对创意写作课程体系的整体性重构。高铭在课程改革层面提出系统构想：以“传统文化解码 + 创意跨媒介表达 + 产业适配”为核心，以“文艺理论现代转化 + 地方文化 IP 孵化 + 非遗叙事”为引擎，打造“AI 写作工作 + 地方文化项目制 + 校企协同”的混合模式[④]。可见，创意写作教学正从通识性写作训练转向更具专业深度与文类特性的精细化发展，其培养目标亦由单一的“作家”拓展为兼具深厚人文素养、娴熟媒介技能和敏锐市场意识的“新型复合型人才”。

实现上述课程设想，离不开创意写作教材的必要支撑。谭旭东与王雅通过综合对比国内已出版的高校创意写作教材，归纳出学科本位、产学研一体化、创意写作实训体系建设三种编写理念，并针对教材建设中的现实矛盾提出了建设性思考[⑤]。随后，吴俊与王明宪基于对新时期以来大学教学经验的总结，针对现状问题展开客观分析，指出应建设学术性的“创意写作学”课程配套教材与实践性的“创意写作”课程配套教材。同时发现，传统纸媒及网络类型小说的创意写作教材编写较弱，具有较大开发空间。另外，他们还通过梳理中国“写作”传统及清末民国时期的写作教材，归纳出涵盖文学类、应用类、译介类、人工智能类四种类型的教材体系[⑥]。这一分类不仅明晰了教材的知识边界，更将教材定位从单纯的知识载体提升为教育理念的物化体现，为未来教材编写提供了明确方向。

第二，国际经验与本土教学。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广的写作工坊，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对全球创意写作教育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冯进的研究厘清了“爱荷华经验”对中国大陆创意写作学科建设的直接影响，尤其聚焦于“工作坊”教学形式的引入[⑦]。张小燕与张永禄的研究则客观呈现了爱荷华工坊的另一面：其曾服务于国际文化扩张的意识形态背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危机以及内部存在的歧视与性别暴力问题[⑧]。这一

① 高尔雅、叶文瑶：《海外高校非虚构写作发展模式初探》，《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 奶奶第 1 期，第 173—182 页。

② 何敏：《创意写作如何教？——以电子科技大学科幻创意写作教学实践为例》，《中国大学教学》2025 年第 6 期，第 87—96 页。

③ 周文波：《精神、技艺与语境——论中文创意写作视阈下的新诗教育》，《写作》2024 年第 5 期，第 121—128 页。

④ 高铭：《智媒体时代下职业本科创意写作课程体系重构：文化传承与产业融合的双维路径》，《传播与版权》2025 年第 22 期，第 101—104 页。

⑤ 谭旭东、王雅：《中国高校创意写作教材的编写理念与编写体系研究》，《东吴学术》2024 年第 5 期，第 5—15+2+161 页。

⑥ 吴俊、王明宪：《关于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及教材编纂的探讨与建议》，《文艺论坛》2025 年第 4 期，第 45—57 页；吴俊、王明宪：《创意写作“史前期”：清末民国的写作类教材及图书编撰述评——中国创意写作教材编撰及图书出版调研报告（一）》，《文艺争鸣》2025 年第 8 期，第 36—43 页；王明宪、吴俊：《现状考察：创意写作“落地”中国到二级学科的确立（2009—2024）——中国创意写作教材编撰及图书出版调研报告（三）》，《文艺争鸣》2025 年第 12 期，第 47—57 页。

⑦ 冯进：《“爱荷华经验”与中国大陆的创意写作学科》，《当代文坛》2024 年第 4 期，第 65—70 页。

⑧ 张小燕、张永禄：《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经验及问题》，《河池学院学报》2024 年第 5 期，第 48—56 页。

“祛魅化”的研究提醒我们，在借鉴国际模式时必须保持批评性距离，并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事实上，中国本土并不缺乏自身的创意写作培养经验。陈彩霞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设立的中央文研所，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培养“自己作家”的重要探索，其经验为以爱荷华大学模式为范本的创意写作提供了中国式的历史参照与实践经验[①]。

深入到具体的教学环节，国内已出现更具操作性和实效性的教学方法。樊迎春以自身教学实践为例，教学设计围绕学生的“读”与“写”展开，使选课学生能够“专业地”鉴赏优秀小说作品，并从中汲取个人创作经验。这一实践倡导回归课堂本身，聚焦具体教学内容与方案，突出了教学的实践双方[②]。徐萌艺与黄健云则通过引入“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写你知道的”“内容优先”和“日常叙事”等核心理念，帮助学生逐步克服写作障碍，激发写作潜能，并构建出以“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悟（理）、言之有趣”等多维评价标准[③]。这种教学方法实际上触及了创意写作教学的核心理念，即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式教学。

另一些学者进入到学生思维与心灵的不同层面，探索创意写作教学的技法。耿弘明将“道德两难”引入写作教学，认为其能天然地沟通批判型写作与创意写作——学生在面对两难情境时，既要“讲故事”，又要进行“元认知”反思，提出“理解经典、诉诸生命、自我表达、批判反思”四个阶段教学法，使“积极学习”理念层层落地[④]。黄灯通过在不同高校的写作教学实践，用丰富的经验揭示了“非虚构写作”与“青年成长”之间的深层关联，提炼出“个体经验的在场”与“内在力量感的唤醒”两个核心理念，论证了写作如何成为学生认识自我、安顿自我的途径[⑤]。

创意写作教学中，学生最常遭遇的困境莫过于“有生活却写不出”“有感受却表达不出”。如何帮助学生超越平凡经验，将其转化为具有创造性的文本，是教学的一大难题。王海峰以一篇散文的修改过程为案例，从“增加足够的细节”到“感知存在的困境”，再到“寻找‘当下感觉’”“建立直觉与修辞的关系”，将创作过程分解为可操作的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习得了创造性地书写平凡经验与普通情感的思路与方法”[⑥]。唐梓彬则将传播学理论引入创意写作教学，以香港都会大学的“中文传意技巧”课程为例，探讨贝克传播理论在微小说创作教学中的应用。他立足香港本科生特质，采用单元研习教学策略，设计教师引导下的自主学习活动，将“传者——信息——受众”传播学框架转化为微小说创作的教学工具[⑦]。

创意写作的教学空间能否突破教室四壁？驻校作家制度为此提供了可能。宋时磊从概念、评价与实践出发，考证了该制度在中国的早期发

① 陈彩霞：《普及与提高：“工农兵”的作家培养和创作实践——以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1950—1953）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24 年第 6 期，第 45—53 页。

② 樊迎春：《张力与舒缓张力——“中文创意写作”高校教学实践举隅与思考》，《当代文坛》2025 年第 2 期，第 104—111 页。

③ 徐萌艺、黄健云：《创意写作理念下作文训练课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107—114 页。

④ 耿弘明：《讲故事与元认知：道德两难在写作教学中的应用》，《当代文坛》2025 年第 4 期，第 99—105 页。

⑤ 黄灯：《“非虚构写作”与“青年成长”——不同类型高校写作教学实践回顾》，《当代文坛》2025 年第 5 期，第 106—113 页。

⑥ 王海峰、周慧：《超越平凡经验的创意写作实践——以一篇散文的修改过程为例》，《河池学院学报》2025 年第 4 期，第 19—28 页。

⑦ 唐梓彬：《“创意写作”视野下的“中文传意”——论贝克传播理论在微小说创作上的应用与教学实践》，《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136—143 页。

展[①]。承接这一制度传统，当代高校持续探索教学创新。萧映与史婉莹以武汉大学驻校作家项目为例，剖析了该校“移动课堂”写作教学模式，指出该模式分为“通识教育移动课课堂”和“专业教育移动课堂”两大类型，驻校作家在多种适宜交流的多种场所与学生互动，有效打破了传统教学的空间限制[②]。

第三，跨学科与融媒体的探索。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在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融合思维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姜瑜的研究紧扣这一理念，从教学内容的跨学科整合、教学策略的跨学科应用、教学主体的跨学科协作以及教学评价的跨学科实施四个当面，论证了创意写作课程在培养跨学科思维方面的天然优势[③]。

更多研究者关注嵌入跨学科思维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过程。梁慕灵与黄树基以香港都会大学为例，展示了该校沉浸式互动与写作教学如何将文学研究、创意写作与数字人文研究相融合，协助学生创作具有新感觉派小说特色的文字[④]。卢文婷提出的“创意写作+”方法论，将写作实践、出版运营与特定年代的文化研究相结合。无论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文学史课程融合，还是“1990年代的她们”微IP开发，都体现出跨学科和跨行业的整合能力，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强可复制性的融合教学方案[⑤]。此外，夏伟提出的“幻想与写实融合”以及借助AI培养学生“困境想象”能力，试图在艺术规律与前沿技术之间寻找结合点，为创意写作的方法论开辟新路径[⑥]。

作为跨学科融合的重要技术载体，生成式AI的崛起为创意写作教学形态带来了深刻变革。大学数字化创意写作展现出跨学科、跨媒介、跨生产门类的特点，其与创意写作研究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⑦]。

当前研究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在写作教学中的应用，展现出技术赋能的广阔前景。在教学实践层面，刘洋结合在重庆大学的教学实践，提出以“分层技术架构”和“非替代性原则”为核心的AI赋能科幻创作教学方案，将大语言模型及多模态生成工具协同应用于设定网络构建、故事大纲撰写、场景描写、初稿修改与短剧改编五个教学环节[⑧]。在课程理念层面，陈楸帆主张创意写作课程应超越传统的技巧教授，通过跨学科融合、想象力培养、写作工作坊实践、人工智能活用、评估标准更新等创新教学方法，着力培养能够“创造世界”和“创造意义”的个体[⑨]。为验证AI的实际效果，卢淑

① 宋时磊：《驻校作家在中国：概念、评价与实践（1967—2001）》，《当代文坛》2024年第5期，第64—70页。

② 萧映、史婉莹：《驻校作家项目的理念与实践——以武汉大学为例》，《中国大学教学》2025年第8期，第55—62页。

③ 姜瑜：《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创意写作课程的跨学科思维培养》，《山西青年》2025年第5期，第175—177页。

④ 梁慕灵、黄树基：《“中文创意写作”常规化后的教学模式建设——香港都会大学沉浸式互动与写作教学研究》，《写作》2025年第1期，第120—128页。

⑤ 参阅卢文婷：《跨界与开拓：创意写作的“+”法——以“20世纪90年代的她们”非虚构写作训练为例》，《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年第1期，第142—154页；卢文婷：《打通界限：“创意写作+”教学概念与实践探索——以创意写作19世纪上半叶法国文学史课程融合为个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4年第2期，第113—126页。卢文婷：《“创意写作+”：新文科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以“1990年代的她们”微IP开发为例》，《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5年第1期，第115—125页。

⑥ 夏伟：《文学抚慰与创意阅读》，《当代文坛》2025年第3期，第98—105页。

⑦ 参阅刘卫东：《大学数字化创意写作的兴起及启示——文学素养、媒介素养与创意素养互通互化》，《河池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第24—32页。

⑧ 刘洋：《人工智能赋能的科幻创作路径革新——以科幻创意写作课程实践为例》，《科普创作评论》2025年第2期，第34—42页。

⑨ 陈楸帆：《DeepSeek之后，我们将如何写作？》，《扬子江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第36页。

怡等人构建了 LLM 赋能的创意写作应用框架，实证研究表明学生在创意构思、表达能力、写作兴趣与创意潜力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①]。凌逾与钟佳倪进一步拓展技术视野，提出构建智能协同机制、沉浸式多模态学习场域及学习效能动态评估体系，将 AI、VR、GIS、GPS、RS 等数字技术转化为文科教学创意工具，以创新“ 文学 + 科技 ”的教学方案[②]。

除此之外，其他特色实践亦丰富了创意写作教学的内涵。在教学模式的创新层面，符韵与戴凡探讨了创意写作与翻译教学的融合路径，聚集作家写作营中的翻译工坊实践，指出“ 学生——小组——老师——作家 ”的学习模式实现了译者与作家的双向写作。一方面，译者为作家提供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作家保障译者语言与文化翻译的准确性[③]。在课程体系的拓展层面，冯汝常提出增设“ 创意阅读 ”课程，认为创意阅读是一种研究性阅读，通过阅读各种创意获取写作经验和创意激发点，反哺创意写作[④]。这一观点拓展了创意写作的课程体系。而在教育价值的深化层面，魏逸扬与邵一平认为将“ 创意写作 ”纳入高校通识课程体系，能以人文理性对工具理性进行“ 修补 ”与“ 纠偏 ”，从而发挥人文教育的平衡作用[⑤]。

结语

学科身份的确认激发了学界对“ 何为创意写作 ”与“ 创意写作何为 ”的新思考，学者们在合法性中夯实根基，在中国化路径中寻找根脉，在教育体系建构中探索未来。“ 创意写作研究的关键问题域在于生成过程，创意写作研究在评估作品创作过程、创意作家培养等过程中促成学术知识的生成。 ”[⑥] 除前文所述聚焦“ 创意 ”发生、培养与转化的动态研究成果外，当前研究还涵盖作品创意写作技巧、基础教育阶段的创意写作探索。创意写作不仅作为学科门类和教学实践而存在，更日益成为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路径[⑦]。总体而言，该领域研究呈现出问题意识与时代关切、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本土意识与全球视野辩证统一的特征。

然而，从“ 入列 ”到“ 入流 ”——真正融入中国语言文学的学术传统、汇入当代文化创意的时代洪流、纳入国民素质培养的教育大计——依然任重道远。近两年来，“ 中国化路径 ”虽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具有理论原创性的成果依然匮乏，相关研究大多停留于“ 在地化应用 ”层面，尚未真正实现“ 理论性创生 ”的跃升。尽管研究触及人工智能、心理学、传播学等交叉领域，却仅止于简单叠加或移植，缺乏真正的方法论融合。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 AI 的积极赋能效应，对其可能造成的创作主体能力消解、评价标准失范及教育目标偏移等问题警惕不够。

① 卢淑怡、褚乐阳、王浙栋等：《大语言模型赋能的创意写作：应用框架与案例实践》，《现代教育技术》2025 年第 8 期，第 25—35 页。

② 凌逾、钟佳倪：《数智赋能 • 融界贯通：高校文学跨界创意教学的新路径》，《中国大学教学》2025 年第 9 期，第 24—29 页。

③ 符韵、戴凡：《作家写作营与译者能力的培养》，《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126—135 页。

④ 冯汝常：《创意阅读与创意写作的异体共构——论创意阅读的存在价值与课程建设意义》，《吕梁学院学报》2024 年第 5 期，第 77—82 页 。

⑤ 魏逸扬、邵一平：《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创意写作”公共通识课设置的必要性》，《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24 年第 6 期，第 58—61+105 页。

⑥ 安晓东：《创意写作研究方法问题：从文学的传统到多学科互涉》，《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68—78 页。

⑦ 罗长青从不同层面系统阐述了创意写作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价值。参阅罗长青：《创意写作驱动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实践、机制与策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5 期，第 187—195 页；罗长青：《创意写作范式：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机制与产业》，《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8 期，第 137—146+187 页。

在现行高校体制中，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的独特地位仍面临困境，其背后所隐藏的“天赋论”与“可教性”“纯文学”与“创意产业”之间的价值冲突，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回应与制度设计。

站在新学制的起点上，未来或可进一步推进本土理论创生、人工智能互动、教育体系贯通、公共文化服务赋能以及国际前沿追踪等方面研究。这些方向的探索，归根结底源于学科自身的根本定位。作为一门以“创意”为灵魂、以“写作”为媒介、以“人”为核心的学科，“中文创意写作”在学科共同体的持续深耕下，必将以愈发成熟的姿态，赓续中华文脉、培养创意人才、服务社会发展。这是学科的使命，也是时代的期许。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创意写作前沿理论文献的翻译、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29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谭旭东，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意写作、儿童文艺。

李霞，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创意写作、儿童文艺。